

文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总结过去、回顾历史。我们相信和强调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毋庸置疑的，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海登·怀特说：“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没有注意到历史表述的临时和偶然的性质，他们曾经注意到历史可以由新的证据或对问题的更成熟的想法而被无限地修正。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在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的。”海登·怀特说的虽然是普通的历史学科，但文学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学的历史也同样总是并一定会因为新的作家及作品的出现、老作家的新作品问世，人们对老作家、老作品所进行的新的分析、新的解读以及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变化及更新，而无数次地被修改、订正。**内蒙古本土小说研究**，时代、时期以及不同作者的各种文学历史的版本，也能够让我们更短距离地接近文学的历史，并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的历史，即使是一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准确的、不甚完美甚至可能歪曲的文学史，也能够让我们在追求真理的旅途中的曲折与艰辛。

西部小说的民间文化精神

文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总结过去、回顾历史。我们相信和强调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毋庸置疑的，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海登·怀特说：“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没有注意到历史表述的临时和偶然的性质，他们曾经注意到历史可以由新的证据或对问题的更成熟的想法而被无限地修正。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在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的。”海登·怀特说的虽然是普通的历史学科，但文学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学的历史也同样总是并一定会因为新的作家及作品的出现、老作家的新作品问世，人们对老作家、老作品所进行的新的分析、新的解读以及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变化及更新，而无数次地被修改、订正、重新写作，事实就是我们都看过许多不同时代、时期以及不同作者的各种文学历史的版本，这些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总是能让我们更短距离地接近文学的历史，并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的历史。

黄薇薇◎著

途中的曲折与艰辛

文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总结过去、回顾历史。我们相信和强调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毋庸置疑的，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海登·怀特说：“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没有注意到历史表述的临时和偶然的性质，他们曾经注意到历史可以由新的证据或对问题的更成熟的想法而被无限地修正。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在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的。”海登·怀特说的虽然是普通的历史学科，但文学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学的历史也同样总是并一定会因为新的作家及作品的出现、老作家的新作品问世，人们对老作家、老作品所进行的新的分析、新的解读以及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变化及更新，而无数次地被修改、订正、重新写作，事实就是我们都看过许多不同时代、时期以及不同作者的各种文学历史的版本，这些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总是能让我们更短距离地接近文学的历史，并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的历史，即使是一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准确的、不甚完美甚至可能歪曲的文学史，也能够让我们在追求真理的旅途中的曲折与艰辛。



草原文学理论研究项目成果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I207.42
H-846

内蒙古本土小说研究

西部小说的民间文化精神

黄薇◎著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藏书



C02355760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小说的民间文化精神 / 黄薇著. -- 呼和浩特 :
远方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555-1304-9

I. ①西… II. ①黄… III. ①西部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7146 号

西部小说的民间文化精神

XIBU XIAOSHUO DE MINJIAN WENHUA JINGSHEN

作 者 黄 薇
责任编辑 张利君 奥丽雅
责任校对 莫 一
装帧设计 韩 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3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铭泰精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字 数 246 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1304-9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序

乡梓方言忆旧

黄静涛

照我的理论，一般说，旧话、老话并不都是废话。老人阅历多、体会深，他们的旧话和老话往往是前事、旧事的写照，是口头的历史记录。他们的话往往能补充文字记录的缺失，订正书面记载的舛误。这里所述，也多是记忆所及的自身所历、所见、所闻和所传闻，权当一个老人的搥边鼓。是为序。

(一)

近来偶然在报刊上看到各地大多在做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又载文学界也在谈论作品的方言论题。自己不属此道，不过，因此我也想到了我家乡的方言研究，那里是不是也有动向？

前些日子，有人从呼和浩特来，带给我几种当地的土产食物，很宝贵，他还把一本名为《方言咀英》的书放在我的文案上。封面上的“方言”二字，入时而又入目。只是当时，正专心别的功业，无暇拜读。幸好后来能腾出一些时间，想起它，就从橱上拿下来。书中介绍这本书是谈内蒙古中部地区（山西人从走西口的故事出发，称之为“西部”）的汉语方言的。著者也是中部汉族人。好。本地人谈本地方言，现身说法，可以视为当地文化“土产”。有点意

思的是当日来人把此书与食物一起给我，这倒使我有兴致，正是“物质文明二土产，齐致异乡异客家”。喜遇啦！

据我看，这本书不是如书名所示谈“言”的。它在训诂，它只谈“词”——这当然可以。这二者相对地说，不尽相同。“词”只是“言”的最小构件，可随意配置的单元，“言”却成句、成话；“词”不表达什么心意，“言”却是人们内心世界情感的流露。这本书的名与实，不太相符。有其名，少其实，辞典的雏形耳。

对于所选汉语诸“词”，著者的功力大致施向两方面：一是解释“词”字的含义，词论，这事历来最难；二是追索这些“词”字的源流。他“追索”的办法不是面向群众，面向实践，而是着眼于汉文书籍（自然不妨）。他从中外文籍中，摘录出与“西部”（实为中部）方言中相同的字词，以证他所说的汉语“方言”是有文字渊源的，是词之“英”，堪“咀”，了不起。但是，我注意到那些书籍（外国的除外）都是长城以南的东西南北地方的作者所著，用东西南北的人通用的文字语言，描述东西南北地方的风土人情，再由东西南北地方的出版社出版的成品。中间无论作者、叙述者或出版家，没有一个是属于长城以北的，那么，书籍中怎么出现了内蒙古“西部”地方的语词呢？是不是长城以北的汉族人南下，向那里的作家传授的呢？不可能，也没有证据。相反，我看只能有一个解释：汉语“西部方言”语词不过是长城以南的语词的移植，正是一些北向移民例如晋人把这些语词带来的。如此说来，还能谈到汉语的“西部方言”吗？那些语词“口”里人也说而且载之书面，更何况书所引不是“言”，只是“词”而已，单独的“词”很难分辨什么地方不地方。

不妨再设想一下，用古证今，用文籍证口语，自来不乏先例。不要说专书如汉代的《方言》、清代的《续方言》、近代的《新方言》，以至于《金元戏曲方言考》等，就是谈论“方言”的不专之书，这种办法也是有的，随手可以指出明代田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就有用古书见证杭州方言的大篇文字。所以，本书著者的办法，不算是新创，自然也可以充分肯定著者的劳绩。他或者

可以看作是内蒙古中部地区出现记述汉语方言语词的先行者——在前我没有看见类似的著作。如是，那就是开风气之先，有功德。

对我来说，“咀英”后，有四点感得。

1. 感受启发。我原是古丰州滩（即所谓“西部”）人。生长在那里，也说那里的汉语方言。但是，自抗日战争开始，我就辞别家乡，远出从戎了。近八十年来，虽然曾经因工作需要，几次受邀回到那里，但来去匆匆，不曾与家乡语言接触，对很多语词已经失忆。此书所列诸词汇，很有启发作用。已失忆的东西又记起来了，而且因此又想起不少书中未列的词语，无形中增进了乡梓之谊。别的同乡老人抑或有同感吧。

2. 此书大致不似科学研究的雕砌，而是以自得的笔调行文的。遣词造句，略示飘忽，不那么沉重。同道们尽可以循此为题，引为谈藪。茶余饭后，聊以遣兴，增加一些生活的闲情逸趣，以文会友嘛！这对于语词的挖掘也应有间接助益。

3. 本书可以是一种案例、示范，它可能无形中在客观上鼓励人们在汉语“西部方言”诸词的研讨路上进一步前进，做更多、更广的努力。它不妨是一个探“词”通津的舟楫，是西部“方言”诸词研究的初阶要得。

4. 是书不必天衣无缝。要求金要足赤，那是苛求。但是，后来者应以此书为戒，不要浅尝辄止，要绕开或失，使得“西部”语词和“方言”的探索，更臻完善。

上述这些话，当然只是一个离乡老人涉猎的一隅之见，老话。不是什么评鹭。权作内蒙古汉语“方言”的学人做点参考。

“方言”及其词汇的确需要探索。这是一片空地，而且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空地。“西部”如此，东部也如此；汉语如此，蒙古语也应如此。印象中，当年绥远省民众教育馆好像做过一点调查，几种志书中也略有涉及，只是不获而中辍了。可叹。

“方言”诸词的种类不一，可以试用各种方式和方法探讨，但是，我想

最重要的还是深入民间，深入实践，不必一味斤斤于或迁就于旧时文籍。文籍所载未必都对，尤其未必都适用于现实的具有地方特点如所谓“西部”的真实含义。我这里顺便举个例子。金元戏曲中，每有“胎孩”这么个词。注家依据原书载文，定释为“骄傲”或“气宇轩昂”之义。我乡中亦有这个词，声韵作“tai hai”，汉文依音韵写作“台孩”“胎孩”“抬颀”（均为古典原文）也可以，但含义却大不相同。一位老农，冬日无事，坐在太阳照射的墙根儿，捉完皮袄里的虱子，伸伸臂，暖烘烘地靠墙睡着了。那个睡态，过路人看见，必说老人睡得多么“胎孩”。又如人家有吃有喝，无忧无虑，别人也说，这家光景过得“胎孩”。有人骑在骡背上，任由它轻步小趋，十分自在悠闲，路人也会说，他骑得“胎孩”。所以，乡语中的这个词，实际意味着“安逸”“闲适”，不是什么“骄傲”“轩昂”。而且从他所引文学语意上，“胎孩”也没有注家所说的含义。其实，“胎孩”云云，是个蒙古语词，是音译的，其含义正是“安闲”。注家的释义与这词的本义似有距离。

又如“捣拉”这个词，在元曲中也有，在诗词中也偶尔出现。它的含义都被释为“歌唱”，因此也写作“倒郎”。但是，《词苑丛谈》却释为“金元戏剧名也，似俗而雅”。为了求证，我翻了我所能见到的元曲典籍，却没有一种戏剧以“捣拉”命名的。其实，这词乃是蒙古语词，含义是“出声”。“唱”，可以是“捣拉”，互相谈话也称“捣拉”。我乡方言中就有这个词，而且使用频繁。就《词苑丛谈》所举例子看，也是描写且舞且歌的一阙《满庭芳》词，并不是什么戏剧。它的释义不够实在。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由此证明迷信古人的、古书的载录，不是好办法，还是要费点力气就地向民间，向实践讨教为妥。那些不见载籍的语言与词字，不见得就不是“英”，我反而以为更“英”一些。方言探究的办法，到底还是得讲究一些。

（二）

“方言”是个大学问。方言研究不宜孤立地看，它只是通常语言总体的一

部分，需从总体的角度考察。

世界上无论强弱、贫富、贵贱、尊卑，人们都承认语言的重要性。梁启超引德国人类学家的话说：“血浓于水，语浓于血，意思是语言为辨定民族的最要紧的标准，血统比较起来，要淡一些。”马克思更认为语言与血统、习俗一样是早先人们共同生产与生活的前提，“语言本身——这是一定集体的产物，而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也就是这个集体的现实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这种语言，一般说，起先都是人们在劳动中发出的自然声演化成氏族语言，后来是部族语言，民族形成后就又成了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要素。

在民族语言的通行与发展链条中，时常会遇到“方言”这个环节，中外古今莫不如此。马克思曾指出，斯拉夫语是“由十种至十二种方言组成的”，这种情况在汉语中，特别是长江及其以南地区也有类似的记录。方言是民族语言形成的关节，同时它也应当是民族形成的环节。

据记载，汉语的“方言”分布之广、形成之久，是著称于世的。古书所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正是指此而说的。“方言”这个概念很古老，在汉代就出现了，而著于书面则在东汉的《风俗通义》上。它正是“方言”的实际存在的反映，它除了将杨雄的书定名《方言》外，又指出古时的统治者有派人到处“采方言”的事例。到处去“采”，说明“方言”之广、之多。所谓“百里不同俗”，不妨看作“不同言”的同义语，即“异俗之语”。马克思指出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活动区所讲的话有四十种各不相同的口音”（《中国问题》1862年），口音也就是乡音，可以拟为乡语、方言。太平军活动于长江流域如吴、越、楚、荆等地，仅这么个区域，方言竟如此不同，此外的地域可以想见。鲁迅先生说：“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区别。”（《门外文谈》）他说的也是南方。梁启超这段话，更具体了：

“以同一民族，而其言语庞杂，沟绝不能相通，则未有中国人若者也。闽粤不必论，而吴、越、鄂、齐、燕，莫不各有其方言。非互相迁就，则相对不能交一言也。不唯省与省为然耳。一省中，一府中，乃至一州县中，出闾而若异域，比比然也。

“吾粤为尤甚。鄙人粤之新会人也。所居距治不过二百五十里，而言语已不能通。尤奇者，与吾乡相距十里许，有一小乡子，有居民万余人，皆李氏，其语并吾乡人，亦一字不解。”（《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你看，多么复杂。如此看来，内蒙古出现东、中、西部地区的“方言”，实在不足为奇了。当然，或者不至于像江南那么纷繁。

方言的形成，应当看作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哪个单独的私人致之的，正像它必将消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不是私人任意左右的一样。

研究方言必须在概念上有个清晰的了解，什么是方言？怎样界定？自己水平低，未敢自信，这里权且冒失一下。不妨假定，某地区山水利弊、气象寒暖、土壤肥瘠以及人文因素等，构造出一种深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宜于吸引和集聚相应的人群。这些人群在这里世代相传，生聚滋息。他们利用周边的地理条件，自耕自织，自给自足，既不与外界互通有无，也没什么货币往来。他们只结成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养成自己的风俗，通行自己地区的语言。语言当然是民族的通行语，却在措辞、命句、语音、语法方面，赋予了独特的成分，以致别地人听不懂，说不来，俨然一种异族语、闭塞语，如前述梁氏所谓那种。而封建制度、交通阻绝以及天灾人祸，加重了这种方言异化，及至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之更加凝重，几乎成为拒绝和抵御外来语的一道壁垒。

我自己也曾是“方言”分子，但是内心总不放心这种方言，希望改进、变革。当然，要承认客观的存在，没法否认既存的方言的现实。

方言的意义何在？这要从正反两方面看。

正面看，方言的存在至少有五个特点：一为切用性。方言植根于民间。群

众在生活与生产中所生发的七情六欲，都从方言中表露出来。为此，方言创造出极为生动活泼的语句。这些语句极具生命力，即使方言一旦消失，这些语句也会在通行语中存留，成为其组成部分，而普通话也必然将这些语句吸收，以使民族语言更丰富多彩。二为凝聚性。共说同一方言的人，彼此总觉得自然亲和、融通，“亲不亲，一乡人”，“乡”就是同语。即使在异乡，遇到操同一方言的人，不论如何陌生，一交谈，特别欣喜。“他乡遇故知”，这据说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这“故知”就是故语，不必只指老友。有个故事说，浙江的钱镠原是乡里的无赖，后来出外闯荡，混得不错，被五代的梁祖封为吴越王。衣锦还乡，聚集乡老，引吭高歌，用的是“官话”，乡人听不懂，反应冷淡，场面失洽。于是他用乡音（吴语）唱道：“你辈见我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长在我侬心子里。”（这恐怕也是文字译语，未必吴音原句）唱完，举座和唱，欢声振席，非常融洽。这个例子表明当年当地方言的凝聚功力之大。这种凝聚力对于保护本地利益、团结本地人成为一体极为重要。三为排他性。对非本地人、说异乡话的人会很戒备，称之为“侬子”，不情愿许彼异乡人加入此乡，以保持自家的纯一性，要来也须融入本地方言。四为自信性。本地人总认为本地方言是民族最正确、最通行的语言。清时雍正年间，福建地方政府曾用闽语向朝廷上报地方政情，朝中没有人看得懂它说了些什么，立即退还原奏，让他们用“官话”（通行全国的汉族正音吧）重奏，并诏令各省都要设置“官话”训练机构。由此可知，本地人是何等自信自家方言。就是清末，不是还有用方言写小说如《海上花列传》的吗？五是稳定性（保守性）。方言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局势的演变，也有演变的趋势，或新造词语，或吸收某些外来词句，但是不论怎么演变，它原有的声韵、语法结构以及语义，终究习惯化不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统一，而地区方言依然没变。普通话也说，而对乡人仍传统地持有方言，觉得顺口、方便、习惯、亲切。约定俗成，实在没有法子。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的消极作用也很强。坚持方言不变，则不利于本

地社会经济的开拓，不利于新物质、新思想、新气象的吸收，不利于与外界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不利于国家、民族的真正统一，不利于民族语言的普及。这种“不利”也要警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通兴，新的社会制度也为研究和改革诸方言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与精神保障。

历史地看，方言形成及其影响，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封建时代，新官异地莅任，第一要事就是采风，而“风”的最大门槛乃是方言。弄不清当地的方言，你就很难入俗，因而你的施政就难通行，即使是今天，也还是仿佛。方言理论知识很重要。实践的需要、资料的积累及经验的增益，已逐渐出现专事方言研究及改革的语言学家，特别是专门的方言学家，现在方言已成为特立的学科，叫作“方言学”，而且有不同的学说，他们的理论体系不可无视。仔细学习一点方言理论知识，对于研究这里所说的“西部”方言，应有实践上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自发的没有理论驾驭的实践大不相同。

自己不是方言学家，对于乡梓语言的了解和研究也很有限。可是对这方面的事有时也挂点心，总觉得方言必然消失，研究它的终结目的不是要巩固它，而是要改革它。可是，究竟应当怎么办，没底。不过，我想鲁迅先生的这些话，倒是很有启发意义，应当重温。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用起来很有意思，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语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使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也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些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言的大众化。……现在确已有着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已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得吃力，听得也吃力，然而终归说得出口，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

‘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且介亭杂文》）

这真是通情达理、宜于整治方言的好方针，其于文学更切要了。但是，我想要付诸实施，一个前提是必需的，这就是调查方言，要熟悉它。

（三）

“西部”方言及其历史的研究，是“西部”民族、社会、移民乃至宗教及其历史最重要的途径，“西部”方言的考察与研究的领域，因此甚为广阔。语言学家及兴趣于此的乡友，在这里尽可以施展才力，纵横驰骋。为今之要在于及早地、迫不及待地做出可行计划，组织力量，有步骤、有方向地广泛调查基层，访问乡耆，积累资料，写出“西部”方言志，编纂方言汇全之类的成文卷档。我不知这一工作是否已经进行，希望没有历史遗憾。

我对这事很有兴趣。但是，离乡这么多年，一切陌生。抗日战争军兴以至于今，那里必然有诸多变化，这对我来说，犹如隔世，没有说话的资格。现在身处异乡，水平有限，体力也不佳，实在是如《诗》所说“吾仪图之，爰莫助之”了。

虽对新事无知，可旧事有些却还依稀。这里就抗日战争前的亲身体验，试着来一点概略的回忆，略抒乡谊，算是为新事贡献一点有限的历史资料，不是有“温故知新”的话吗？我所说的“家乡”，专指人所共知的土默特川，即以土著——土默特人而名的平原，俗讹为“土慕川”。它的范围即后来的七县二市领域，面积北至大青山，南达长城“二边”，东至卓资山，西迄黄河。这里平垠无遮，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物华天宝。“海海漫漫土慕川”，历来境内境外人们的口头禅如此。五原、临河及伊克昭盟，被称为“套”，不在此域内。

这里是个民族迭兴区。现在几个民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汉族）彼此杂居，汉语为各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这个历史已经很久了。

这篇文章，大致从三个方面铺陈：话、谚语、谣，这都在方言范围内。

首先，话。

1. 通行的几乎无例外的是山西话，这是山西移民（或流民）带来的。这里的居民除世代土著土默特人外，都有晋裔身份。因此，所谓“方言”，只是晋语的移植，它没有如前述的江南方言那样复杂，那么隔绝。

但是仔细回想，好像也有声韵上的不同。如在归绥城内，归化城区一般居民在语音上，略似晋北的大同、右玉地方话，调显轻浮；在商业、金融界则多晋中以下地方的口音，调似醇厚；回族居民，也通行一般市民语；老年中，陇东语调不少，语中夹杂教门和阿拉伯语词。我听见他们中的贫民向本族住户乞讨时，就喊阿拉伯话，我就听不懂。绥远城（习惯上叫作“新城”）的居民一色是满族，他们彼此间说不说满语不知道，他们来自北京，说汉语，一口纯正的京腔，与旧城（即归化城）的通行语截然不同，特别明显。他们吃皇粮，举止很盛气，旧城人视其为“异类”。有人间或学这“京腔”，就辄受非难，讽之为“俩钱买个羊蹄子——咬筋”（“筋”即“京”的谐音），京腔不过是个“羊蹄子”，也不值钱。清朝倒台，“皇粮”没了，穷蹙开始，他们只有放下架子，就近向身边的旧城找出路。可这语言就得过关，一下子改音，去“京”入“晋”，不易呀！于是就在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又“京”又不“京”的兼京兼晋的语调，听起来特别别扭，不用问，说这种东伦西类的话调，绝对是新城的满族。当然，这种语言也正是西部方言的部分，是晋语中的变体，它有合理性，人们也接受。

乡村即七县二市地，通行晋语。沿近黄河的地方（如萨、托二县）也间有秦陇口音，某些话也不易听懂，如这样的话：“格格哈勒乙哥特，吉吉磨来可舍千，舍勒佛，得乐乙前，达得车勒特哈兰”，这是循口音而录的语句。你能听懂吗？原来，他说的是：“刚刚喝了一缸子汤，急急忙忙扛上枪，上了房，当啷一枪，打得苍狼躺下了。”谁能想到竟是这个！但是，掌握了这种口音的规律后，也能听出它的原义来。

此外，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等靠长城的地方与大青山山麓的居民口音也不甚一致，它们更接近“口”里晋北原话。

2. 在这种通行的共同语言中，无论词、语调还是语法，都是别的地方绝对没有的，这就是民族因素，主要是土默特语因素。

土慕川在“风吹草低见牛羊”时代，称“敕勒川”。通行的当然是敕勒族（即高车）语（或鲜卑拓跋语）。土默特人兴起，全域通行土默特语（蒙古语的方言），一切地名、物名及社会生活用语，无一例外。这种语中是否有前民族（如突厥、契丹）语词的成分，没有研究过，理论上说应当有吧。

汉族流民进入本川，开始是“雁行”，春来秋去，为利而来，得利即去。后来率兴留居，成为土慕川人。但是受本地世代“土著”排斥，就不好办，出路一条是学土默特语，这自然不易。他们在与土著的交往中，时间既久，也就有了门道，编出口诀，像《急就章》一样，成为蒙古语的“蒙学”者的开蒙诀、入门编。这样的东西好像不少，只记得这么几句：“庭格儿天，赶只尔地，人孔马麻利，骆驼体面羊哈尼，老子阿巴娘埃记，……”编法很巧妙，句法有律，又有韵脚，很符合汉语规律，易记易说。这样，汉语的天、地、人、马、骆驼、羊、父亲、母亲这几个蒙古语名称都学会了。这些都是自愿自行的，没有谁强迫。当然，它与蒙古语原韵有距离，不容易听懂，土默特人虽然不免讪笑，毕竟也能意会地接受。

土默特生产方式的转型，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市场的发展，致土默特语言使用范围越来越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使用它的人数也越来越少。这种语言到处碰壁，一代传一代，它终于被历史边缘化，进而被淘汰。首先就在大小黑河两岸。这里的土默特住户最早被汉语化，明代人指之为“汉夷”，即汉化了土默特人。这些人丢弃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把汉语（主要是晋语）当作自己的“祖语”，却嘲笑依然保留民族语言的大青山山麓的土默特人，其实这反而嘲笑了他们自己。后来，山麓的土默特人也不得不历尽沧桑，被迫放弃民族语言，而向汉语靠拢，融于汉俗。清朝虽然屡颁禁令，但是人为的禁止，怎么

挡得住客观的历史潮流。

整体上，土默特本语消失了，也就是前引马克思所说的民族前提失落了，土默特没什么民族语言特点了，但很多语词似乎很有惰性，仍然留其活力，在通行的汉语中频频出现，例如地名。土默川的乡名、村名，百分之八九十是土默特语，汉名不多。汉语通行时绕不开它，你必须照样说，你硬要把它改成汉语，绝对行不通。又如很多物名也是如此，如“棒子”称“卜浪”，“怪柳”称“速亥”，“松鼠”称“格齐”，“山雀”称“百林”，“野玫瑰”称“马入”，等等；此外还有：一种搅拌的面食称“苦雷”，“盗贼”称“忽拉盖”，一些山柴也有“蔡忽拉”“爬柚”“赫各林”等名，等等；动词如“收拾”称“忽拉”，“跑”叫“扛”，“运输”叫“忒”，“追”叫“段”，“扔”叫“曼”，“磕头”叫“毛儿古”，“死”叫“五亏生”，等等。人唱“大青山的鲁委一布溜溜灰”，“布溜”意即“灰”；又唱“东南风习路路吹”，“习路”即汉语的“凉”，如此等等。在其他形容词、副词等领域也有诸多蒙古语词，是人们习惯、无法避免的。这里不便繁举，以省篇幅。可笑的是，人们有意无意间把这些民族语词，当作汉语中的“土话”了！

土默特蒙古语方言没有留下文学记录。探索与研究这个消失了的方言，不免叹难。现在这只能作为一个议题留存人间，待后来的识者从头收拾吧。

汉语中使用蒙古语语词，并不始于归化城土默特地，例如元曲中就有事例可寻。元杂剧《射柳捶丸记》第三折：

“阻字云：不会撒因抹邻（蒙古语义‘好马’）

党项云：也不会骂门速门（蒙古语义‘弓箭’）

阻字云：好米哈（蒙古语义‘肉’）吃上几块

党项云：打刺孙（蒙古语义‘酒’）喝上五壶

阻字云：莎塔八（蒙古语义‘退缩’）了不去交战

党项云：杀将去牙不牙（蒙古语义‘走走’）不

阻字云：来者何人？我都哈刺儿（蒙古语义‘杀’）了，看这虎刺孩（蒙

古语义‘强盗’)武艺高强。”

这是一出演绎契丹与宋人在云州(即今土慕川)战争的杂剧。二位契丹大将说的汉语中,竟夹有如此清晰的蒙古语词。戏曲或戏台上的这种语法,其实是社会通行的集中反映,可见它的影响之广。

山西地区,据戏曲史家的考证,实际是金元北方杂剧的始发地。他们在晋南地方的乡镇找到宋、金、元等北方杂剧的演出舞台,特别是洪洞县明应王殿内元剧壁画,更增加了元杂剧在山西的繁盛映照。而且还证明,杂剧的创作与演出,甚至是山西本地人用金元语演唱。20世纪20年代,晋剧北路梆子到口外的土慕川流动演出,有一出《金沙滩》,其中金国兀术喊他的兵将为“巴都鲁”,不说“将士”,与宋朝战将韩昌对阵时,都不先唱早安,而呼“蒙斗”,以示敬意,其动作也仿蒙古式。可见迄今为止,剧中引用的蒙古语仍然未改。

晋地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进出之所。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的记载。汉以后,特别是晋永嘉以后,历代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羯、契丹、女真、蒙古等,都曾进出山西。民族冲突增加了,可民族交流首先是语言交流也增加了,各族语言中夹杂对方的语句,好像也成一时风气。

元亡,明兴,屡次颁发诏令:禁止胡语(即蒙古语)。“禁”,说明蒙古语在汉人中通行;“屡”,说明禁而不止。大量山西流民涌入土慕川,普遍在汉语(晋语方言)中使用蒙古语,一方面是交往的需要,是历史形势的不得不然,而另一方面如元曲及“胡语”这种约定俗成的传统风气,历史先例,也是原因之一吧。

3. 方言声调。

自古汉语都讲平、上、去、入四声。隋《切韵》、宋《广韵》都如此。元《中原音韵》一出,来了个大转变,否认有入声,把它分别入阳平、阴平、上声、去声中。著者周德清是元曲家,他的主张是依据元曲中各角所唱辙韵